

唐詩人行年考

續編

譚優學著

巴蜀書社



唐诗行年考
续编

谭优学著

巴蜀书社

一九八七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周道贵
版面设计：刘江

唐诗人行年考(续编) 谭优学

巴蜀书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0.75 插页1 字数232千
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2,690 册

书号：10329·33 定价：2.20 元
ISBN7—80523—007—2/I·3

赘言一席聊代序

拙撰《唐诗人行年考》自一九八一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梓行以来，尚承同行前辈奖誉，后起新秀嘉许和朋辈的热情鼓励。或赐书匡其不逮，或其鸿文亦间有齿及，对我都是一种帮助和鞭策。

也有同志希望早点搞出二集、三集来。我当然很愿意继续努力。无奈腹笥空空，功力不足，教学和其他杂事又太多，老没时间，迟迟弄不出来。作家可以请创作假，著作者却无法请著作假——假如区区也勉强妄图挤入著作者那个行列中去的话。也许“上课发水”、“动机不纯”，八五年下半年一个学期中，在肩负着两门新课，经佑着一个病人的情况下，忽然发愤起来，“考”了七个诗人，大约十多万字。加上原来发表过和没有发表过的，凑成这本《唐诗人行年考续编》。总算还了一大笔“文债”。对于开拓唐诗研究领域，深究一个作家作品，想来是有点用处的。我做了收集一点资料的工作，好比几块砖石或几件预制板，贡献给修建“唐代文学大厦”的工程师和技术员，是否合规格，值不值得用，能否用得上，那就非愚所及

了。

我自以为是“官居”“唐诗国度”中的“拾遗”、“补阙”。有拾漏了的，有拾错了的；有阙而未补的，有虽补而补错了的。这么说，不是我“虚怀若谷”，有谦逊的美德，实在是从事这种撰述工作的逻辑的必然。只不过在主观上力求竭尽一己绵薄，少一些讹谬就好，绝不敢说鄙见就正确无误。所以希望得到前辈、朋辈、后起新秀们的不吝赐教，予以驳正。

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，唐代诗歌的研究就更加有强光发出，能炽烈地燃烧起来，如火如荼！

前人把创作归为“文苑”，把著作归为“儒林”，这很对。后来合二而三分之，曰：考据、义理、辞章。这样分更对。考据意在求真，义理意在求善，辞章意在求美。这个本本意在求真。欲求其真，必求详尽，巨细不遗，因此也就难免不得稽、慎订，七零八碎，有些人很不喜欢，说是“烦琐考证”。这难怪，志趣不同，各有所好嘛。不过，在求善即讲思想性，求美即讲艺术性时，能够利用考证成果，从坚实的基础上出发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那就稳当牢靠得多。所以考证方面的东西，实际上该归入求真的科学类著作中去。

繁琐慎订的东西，读来容易令人生厌，这也是实情。那么，为了吸引读者，“扩大市场”，应该写得有文采一些。如果弄成“言语无味，面目可憎”，那就失败了。个人窃以为，写这种东西，纯粹一律文言文行文，似乎有点不合时宜；纯粹白话文行文，有时又觉得太拖沓，拉长了篇幅，还大有多捞稿酬之嫌。我是之乎者也、的呀吗呢齐驱上阵的。又窃以为，语言词汇丰富点，宜白就白，该文即文，说不定会产生一些趣味，不

致于使读者看着看着就打盹了，这不就广结善缘了么？想是这么想，实际上还未必能作到。

万一有文教记者不耻下访，拿着长长的扩音筒伸在我面前，请说说为什么您要考证这十来位唐诗人的行年？——杞人忧天！我可回答不出。因为并未事先内定下请柬，也无上级指示，全凭兴趣和心血来潮的好奇心。比如说，宋之问是不是真的给张易之捧过溺器？沈佺期贬在驩州的生活情况怎样？薛能吹他的诗好得很，白居易、刘禹锡的杨柳枝词远远赶不上他作的，又大骂咱们的诸葛武侯，这引起我极大的好奇，想弄个彻底明白。有些则是多年前读到他们的一联诗、一首诗，别人并不一定认为好，而我认为是好的，“扬子江头杨柳春，杨花愁杀渡江人”啦，“胡蝶梦中家万里，杜鹃枝上月三更”啦，“猿啼洞庭树，人在木兰舟”啦……近年动了念头，下决心要把这些作品的主人弄个究竟，看个明白。果然也就由无知到有知，由知之甚少达到知之较多了。有时也难免产生“原来如此啊”的“爽然若失”，反而冲淡了几分我原先感觉的那种神韵之美。看来靖节先生的“不求甚解”，也还是大有妙处的。不过，同时也发现《唐才子传》和两《唐书》上他们的传，往往把才子们最重要的、与其作品有密切联系的时、地、行止给忘了，删却了。我就为之拾遗、补阙。

说也凑巧，这个本本里的大名家、小名家、大才子、小才子、小小才子，除王建宋之问而外，全和四川发生过或多或少的关系。雍陶是成都人，二薛在四川做过州官，崔涂来成都考过进士，其他或行役、或旅游，或幕府从事。无意的偶合，使他们“偶合”在这本小书中，很有点“地方主义”色彩嫌疑。用得

着文言文了，则此书承巴蜀书社梓行，不亦宜乎。

书中十三位诗人的先后“座次”，仍然照上本书的办法：“叙齿”。虽然说“朝廷莫如爵”，除崔涂外，十二位都是居官在爵的。但目下一提起官老爷，有些人就反感，不宜采用，既惹众怒，也不科学。再则，官高的，未必诗就做得更好些。所以我将他们通通“削籍为民”，来个“乡党莫如齿”，一律按他们出生年代的先后，即“叙齿”的办法，年长的在前，年幼的居后，天公地道，这是怪不得谁的。假如这十三位诗人死而有知，精灵不昧，可能也会感激我的办公道。

其他一些想法，上本书的《前言》已经言过了，还算数，没有变。这里就不再啰嗦。

这本拙稿承友人徐无闻君的关怀，为封面题签，我是很感激的。深谢了。

谭优学

一九八六年二月三日

目 录

赘言一席聊代序	1
宋之问行年考	1
沈佺期行年考	38
王维生平事迹再探	64
戎昱行年考	77
王建行年考	102
许浑行年考	132
雍陶行年考	168
薛逢行年考	184
马戴生平考论	207
薛能行年考	225
李频行年考	254
郑谷行年考	276
崔涂行止考实	316
附录	
也谈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	329

宋之间行年考

宋之间，我国文学史尤其诗歌史上的关键性作家之一。然其品格卑下，为人所鄙贱，故多年以来，鲜有专文论及。虽两《唐书》之《文苑》、《文艺》均有传，《唐诗纪事》、《唐才子传》论述亦立专门，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唐文》中收录之间诗文亦颇不少，然纷繁错杂，无头绪线索，时地弗清，间有碍于理解。故之间生平虽轮廓清楚，但并不具体，亦时见讹误。本文拟以其诗文结合其浮沉进退，具体落实其写作时地，或有助于深入研究唐代文学者。盖持不以人废言之旨云。

之间，字延清，一名少连。虢州弘农（今河南灵宝西南）人。一说汾州（今山西汾阳）人。两说之间诗文中均无迹象可求。今从《通鉴》，取第一说①。

之间生年不详。傅璇琮所为《杨炯、卢照邻简谱》（以下简称傅《谱》）定为高宗显庆元年②，或得其实，今从之。

父令文，“有勇力，而工书，善属文。高宗时为左骁卫郎将，东台详正学士”（《旧唐书·宋之间传》。以下简称《旧·传》）。仪凤四年（679）曾使吐蕃。时之间同榜进士张𬸦《朝

野金载》（以下简称《金载》）卷六曾记其“勇力”事云：

“宋令文者，有神力。禅定寺有牛触人，莫之敢近，筑围以阑之。令文怪其故，遂坦褐而入。牛竦角向前，令文接两角拔之，应手而倒，颈骨皆折而死。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书，得四十字诗。为太学生，以一手挟讲堂柱起，以同房生衣于柱下压之。许重设酒，乃为之出。”

之间有两弟：之悌、之逊（一名之望）。《金载》续云：“次之悌，有勇力。之悌后左降朱鸢（今越南河内之南），会贼破驩州（今越南荣市），以之悌为总管击之。募壮士，得八人。之悌身长八尺，被重甲，直前大叫曰：‘獠贼，动即死。’贼七百人一时俱剗，大破之。”之间《旧·传》谓：“之悌，开元中自右羽林将军出为益州长史，剑南节度兼采访使，寻迁太原尹。”又《李太白全集》卷十五有《江夏别宋之悌》，则太白、之悌亦有友谊。之逊不但“善书”，而且是歌唱家。《金载》卷一曾记其轶事一则云：“洛阳县丞宋之逊，性好唱歌。出为连州参军。刺史陈希古者，庸人也。令之逊教婢歌。每日端笏立于庭中，呦呦而唱，其婢隔窗从而和之，闻者无不大笑。”可见其作风随便。后以告密（或告密在前）升迁，那就太“随便”了。

之间出身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于其为人和创作，或有一定影响。

高宗显庆元年丙辰（656）之间生，一岁

傅《谱》本年下谓：“宋之间约生于本年或稍前。”论证翔实充分，于之间生平亦无捍格，今从之。

高宗上元二年乙亥(675) 二十岁

之问第进士，可定在本年。

《新唐书·宋之问传》（以下简称《新·传》）云“甫冠”。《旧·传》云：“弱冠知名，尤善五言诗。当时无能出其右者。”清徐松《登科记考》于本年下列宋之问进士及第，引《唐才子传》：“上元二年进士。”同榜知名者：沈佺期、张𬸦、刘希夷。之问得第，当以“尤善五言诗”之故。然今之问集中，未见二十岁以前作品。二十岁以前之行止亦不可考。

武则天授元年庚寅(690) 三十五岁

是年，武后正式称则天皇帝，改国号为周。

之问在洛阳，官洛州参军事，疑始于本年前。奉敕与学士杨炯分直习艺馆，馆在洛城西禁中。

按之问甫冠进士及第，即可入仕。迄今达十五年之久，不大可能无职赋闲。而诸书惟《旧·传》于其第进士后即云：“初征令与杨炯分直内教，俄授洛州参军。”岂以一无官职之普通进士而被敕为内教学士？故余疑之问当以洛州参军，文名卓著，乃始被敕分直习艺馆耳。则本年以前已为洛州参军。惟不悉始于何时。

之问《秋莲赋》云：“天授元年，敕学士杨炯与之问分直于洛城西，入阁，每鸡鸣后。”《旧·传》亦云：“初征令与杨炯分直内教”，教宫人书算。《新·传》谓：“甫冠，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。”云之问“甫冠”，大误。说详傅《谱》。

是年，之问有《早秋上阳宫侍宴序》云：“臣闻神器至

大，非圣无以光临；宝位至尊，非神无以长守。我金轮圣神皇帝，垂妙觉，抚鸿勋，出轩宫而镇紫微，卷翠衣而袭元充（即玄充，帝王礼服。元通玄，充为袞之误字），释罘祝网，万族咸宁，革故维新，五刑不用”。此言武后正式称帝改国号之意。而改国号在九月，序不应云“早秋”。意必已有成议，或至九月始布之天下。

其《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》诗云：“广乐张前殿，重裘感圣心，砌冥霜月尽，庭树雪云深。旧渥蒙宸御，慈恩忝翰林。微臣一何幸，再得听瑶琴。”此总言直内教（忝翰林）情况。时光不止一年。

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乙未(695) 四十岁

在洛阳，扈从武后封嵩山，有诗。

《旧唐书·则天皇后纪》：“万岁登封元年，腊月甲申，上登封于中岳。大赦天下，改元，大酺九日。丁亥，禅于少室山……癸巳，至自中岳”。

之间扈从预此“盛典”，有诗《扈从登封途中作》，下四云：“谷暗千旗出，山鸣万乘来。扈从良可赋，终乏掞天才。”又《扈从登封告成颂》云：“复道开行殿，钩陈列禁兵。和风吹鼓角，佳气动旌旄。后骑回天苑，前山入御营。万方俱下拜，相与乐升平。”又《扈从登封告成颂应制》有“百灵无后至，万国竞趋前”，“济济衣冠会，喧喧夷夏俱”诸语。写得气象高华宏阔，场面肃穆伟大，此正宫廷文人本色。范文澜称武后、太宗是唐朝最英明的两个皇帝，玄宗只能算半个，那么，之间这种奉和应制之作，也反映了当时则天御宇的

部分现实，不全是粉饰。犹汉大赋歌功颂德、润色鸿业之意。

两《唐书》之问传均于“分直习艺馆”下，即云：“累转尚方监丞。”按之问官洛州参军已久。据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，京兆、河南、太原等府之司录参军事，正七品上。如已改为尚方监丞（少府监，武后光宅元年改名尚方监），从六品下，则仅升一阶，官运不算亨通。然直至本年犹未转也，说详下。

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丙申(696) 四十五岁

本年秋冬，之间使往天平军，次年春南返。有诗题为《使往天平军马约与陈子昂新乡为期及还而不相遇》。

是年五月，“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，杀都督赵文翙，举兵反，攻陷营州。”“秋八月，张玄遇、曹仁师、麻仁节与李尽灭（尽忠改）战于西硖石黄麌谷，官军败绩，玄遇，仁节并为贼所虏”（《旧唐书·则天皇后纪》）。河北震动。“九月，命右武卫大将军、建安王武攸宜为大总管，以讨契丹”（同上）。陈子昂以右拾遗随军参谋。据诗题，知之问此诗系本年秋冬作。诗云：“恒碣青云断，衡漳白露秋。”陈子昂诗有《征东至淇门答宋十一参军之问》云：“碧潭去已远，瑶华折遗谁。”称之问为参军，所言时令亦合。子昂又有《同宋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》，亦称之问为参军。可见本年秋之问仍为洛州参军。亦不悉是否本已转官而仍称其旧职？新乡，今河南新乡。淇门在新乡稍北。

之问使往之天平军所在不详。然据《新唐书·兵志》及

《方镇表》二，时无“天平军”而有“天兵军”，属范阳道。地当今山西、河北北部。之问诗又云“幽郊”，则“天平”必“天兵”之音近讹误。天兵军亦即开元中所置之河东、大同二镇。张说曾领天兵军节度使，见《旧唐书·张说传》。之问又有《军中人日登高赠房明府》云：“幽郊昨夜阴风断，顿觉朝来阳吹暖。”人日，阴历正月七日。又《燕巢军幕》云：“非关怜翠幕，不是厌朱楼。故来呈燕颔，报道欲封侯”疑亦系一时之作。言人日，言燕巢，按之时令，则其南返当在次年（神功，九月改）春。之问此次出使天兵军，当与大举讨契丹有关。

武则天圣历年戊戌（698） 四十七岁

在洛阳。疑已转官尚方监丞。病中，杜审言自洛阳丞贬为吉州司户参军。之问、子昂等均作诗饯送。之问诗云：“卧病人事绝，嗟君万里行。河桥不相送，江树远含情。别路追孙楚，维舟吊屈平。可惜龙泉剑，流落在丰城。”龙泉，喻审言之睿谔；丰城，代审言贬往之地。此事参详傅璇琮《唐代诗人丛考·杜审言考》。

《送合宫苏明府颋》诗，疑本年在长安因此事作。

合宫，即河南县之改名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：“垂拱四年，分河南洛阳置永昌县。永昌元年，改河南为合宫县。神龙元年，复为河南县。三年，复为合宫县。景龙元年，复为河南县。”唐人习称县令为明府。此诗，之问于长安送苏颋赴神都为合宫令之作也。诗云：“赤县求人隐，青门起路歧。”谓自长安（青门）送苏赴合宫（赤县）任。“翟回车少别，鳬化舄遥

驰。神哭周南境，童歌渭北垂。”谓苏作县令（鳧鳩）于河南（周南）而童歌渭北，盖指苏颋原籍雍州武功（渭北）将起童谣颂其为政之美也。苏颋袭父瓌封许国公，与燕国公张说，当武后、玄宗之世，文辞高华富赡，合称“燕许大手笔”，名位通显，位至宰相。然而两《唐书·苏颋传》，却多疏略，未及其为合宫令。万岁通天二年（九月，改元神功），策绝伦科，苏颋中第，除赤县合宫令，当在是年或次年。

武则天久视元年庚子（700） 四十九岁

在洛阳，以尚方监丞预修《三教珠英》。书成，转官左奉宸内供奉。

《旧唐书·张行成附张易之、昌宗传》：“久视元年，改控鹤府为奉宸府，又以易之为奉宸令。”“天后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。”“以昌宗丑声闻于外，欲以美声掩其迹，乃诏昌宗撰《三教珠英》于内，乃引文学之士李峤、阎朝隐、徐彦伯、张说、宋之间、崔湜、富嘉谟等二十六人，分门撰集，成一千三百卷上之。”《通鉴》：“久视元年六月，改控鹤为奉宸府，以张易之为奉宸令。太后每内殿曲宴，辄引诸武、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。太后欲掩其迹，乃命易之、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《三教珠英》于内殿。”按此书今不传。

之间《旧·传》云：“累转尚方监丞，左奉宸内供奉。”《新·传》同。是则之间以预修《三教珠英》，由尚方监丞转官左奉宸内供奉，跻身武后近侍之列。《旧·传》云：“易之兄弟雅爱其才，之间亦倾附焉。”《新·传》则云：“至为易之奉溺器。”遭人鄙贱，此一端也。《旧·传》较审慎，无此

一笔。按此说始见于《金载》卷五：

天后时，张岌谄事薛师（怀义），掌擎黄幡，随薛师后，于马旁伏地，承薛师马镫。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糞秽。宋之间捧张易之溺器。并偷媚取容，实名教之大弊也。

以同时人言同时事，似可信，然余细按此说可疑。张岌擎黄幡随怀义，马旁伏地，承怀义马镫，路人容或见之。郭霸尝来俊臣糞秽，岂张岌所亲见？郭亦未必以此卑贱下作之行夸耀于人。而《通鉴》长寿元年纪：“郭霸拜监察御史，中丞魏元忠病，霸往问之，因尝其糞，喜曰：‘大夫糞甘则忧，今苦，无伤也。’元忠大恶之。遇人辄告之。”此当据《大唐新语》卷九所纪。与《金载》又不同。至易之所居高堂华屋，密室层轩，岂有如民间置溺器于床侧，欲小解，之间即趋前捧之以进？侍儿婢仆何在？如以之间侍易之，阴谋策划军国重事于密室，不容第三者在场，张岌又何从知之？且如有阴谋策划，何诸书绝不见记载？夫以易之贵盛，势倾朝野，必其宾客满座，易之即对客便溺乎？总之，此说不近情理，难免传谣之嫌。且之间时已跻身于最核心之统治集团，名成利就，其文词亦早已获天后赏识，何须还为易之捧溺器？此说确实可疑，故《旧·传》、《通鉴》均不取。

左奉宸内供奉，略高于尚方监丞，亦不至五品。余又疑左奉宸内供奉，乃奉敕兼衔，其尚方监丞仍旧。

是年，则天幸三阳宫，之间扈驾侍宴，有诗。

《旧·纪》圣历二年，腊月，“造三阳宫于嵩山。”《通鉴》同年纪：“太后幸嵩山……作三阳宫于告成之石淙。”胡注：“三阳宫去洛城一百六十里。万岁登封元年，改东都阳城县曰告成，以祀神岳告成也。”又《旧·纪》久视元年，“夏四月戊申，幸三阳宫，秋七月，至自三阳宫。”次年大足元年（701），“夏五月，幸三阳宫，秋七月甲戌，至自三阳宫。”之间诗《三阳宫侍宴应制得幽字》云：“离宫秘苑胜瀛洲，别有仙人洞壑幽。岩边树色含风冷，石上泉声带雨秋……微臣昔忝方明御，今日还陪八骏游。”方明，见《庄子·徐无鬼》：“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，方明为御。”这表明他是天后的近侍宫廷文人，且为时已久，故曰“昔忝”。此诗不悉作于本年或次年，今姑系于此。

宫廷文人宋之问等预天后、中宗游宴，应制奉和之作，传为艺坛佳话者，当首推龙门赋诗夺锦袍及中宗时昆明池应制赋诗第一这两次。

《唐诗纪事·宋之问》云：“武后游洛南龙门，命从臣赋诗，先成者赐以锦袍。左史东方虬诗成，拜赐。坐未安，之问诗后成，文理兼美，左右莫不称善，乃就夺锦袍衣之。”检两《唐书·本纪》、《通鉴》均无“武后游洛南龙门”之记载，盖以其地极近之故，故其诗不能系年。兹以其性质近似附论之，系于此，用观之问此类作品之全貌。

从臣赋诗者极多，岂天后一一“睿览”？盖上官婉儿代为甄拔，最后天后决定。而婉儿“自（万岁）通天以来，内掌诏命，掞丽可观。尝忤旨当诛，后惜其才，止黥而不杀也。然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”（《新唐书·上官昭容传》）。实际